

# 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制度变迁的视角<sup>\*</sup>

高桂娟 张荣国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本文以制度变迁的视角, 主要从大学组织内部运作、大学组织与外界的关系两个方面考察了中世纪大学向现代转型的阶段与过程, 对比分析了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区别, 并在结论部分指出了中世纪大学制度变迁的渐进性特征。

[关键词] 中世纪大学; 现代大学; 大学制度; 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8) 01-0013-03

## 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rom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Modern Ones

GAO Gujuan, ZHANG Rongguo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article inspects the stages and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of Middle Ages, to modern ones mainly in the organization's internal ope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ty's organizat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in Middle Ages and the modern ones are compared and analysis. Then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istic of institution changes of the universities in Middle Ages are pointed out in conclus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the middle ages; mod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changes

现代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显示出, 一部大学发展史, 就是一部大学制度演进史, 制度创新是大学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 现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大学制度整体性或局部性的转变。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 中世纪大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的直接发端。“观今易见古, 无古不成今”, 从制度层面探讨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对于当今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不无补益。根据制度的内涵及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 本文以大学组织为大学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 主要从大学组织内部运作、大学组织与外界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阿什比曾形象地把大学发展比喻为动物和植物一样的进化过程。<sup>[1]</sup>那么,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 它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通过里程碑式的事件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6至18世纪末, 大学由一个宗教机构逐步世俗化, 从而突破了基督教的壁垒, 为与神学大相庭径的科学全面进军大学扫清了道路; 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初, 以柏林大学的改革为标志性事件, 柏林大学的制度创新成功地使科学与教学相结合,

由此完成了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

### 一、大学组织的世俗化

伴随着教会势力的下降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大学开始趋向于向世俗生活开放。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崩溃改变了大学以它为基础的一些习惯规则, 世俗化在大学里有诸多表现。

首先, 从大学组织成员的变化看。教师的身份大不同往日。修道院式的生活和教师独身生活渐已绝迹; 在中世纪靠教会领地为主要收入的教师, 越来越依靠他们自己的工作获得报酬——要求学生为听课付钱, 而教会对此最终已无力干涉; 可以无偿地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苦大学生的数量, 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 一再予以削减。与此同时, 原来涌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逐渐停止,<sup>[2]</sup>新兴贵族子弟、商人及一般市民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大学学习。例如, 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 中小资产者的子弟渐多地跨入大学之门。以剑桥的圣约翰学院和凯伊斯学院的学生为例,

\* [收稿日期] 2007-02-27

[作者简介] 高桂娟 (1964-), 女, 河北乐亭人, 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副教授, 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来自富贵家庭的子弟占一半以上,约15%来自工匠和店员家庭,12%—30%来自律师、医师、教师、商人之家;而且圣约翰学院约有15%的学生是小地主、农民、平民以及中产者的子弟。<sup>[3]</sup>在十六和十七世纪里,中世纪那种“门徒”式的大学生发展成为近代的学生。学生的外表上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例如,在德国,原先的“门徒”由大学规章强迫跟从牧师的服装和行为,但自十七世纪以来,学生的服装和举止,都采取骑士的方式。带着轻剑,是骑士装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决斗也进入了大学世界。<sup>[4]</sup>大学组织成员的诸多变化,也必然导致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大多是教士的身份,这很有利于像波隆那大学那样的“学生大学”的组织形式存在,而在教会失去对大学的控制之后,昔日的“学生大学”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学生实际已远离权力的中心,大学组织模式统一为一种新型的巴黎大学式的“先生大学”模式。这种模式权力掌握在由教师组成的评议会(senate)中,由校长代表评议会施行。<sup>[5]</sup>

大学与外界关系的变化尤为明显:教育权力逐步由教会向国家转移,国家与大学的关系逐步密切。国家政权或世俗王权通过改组或创办新的大学等手段,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大学的支配权,大学逐步脱离了教会的控制,成为为地方政治或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随着民族化的进程,在大学教学中的通用语言拉丁语逐渐被民族语言所代替。在中世纪大学时期的“国际性”特点消失了,大学可以不分国别、地域、民族招收学生和聘请教师的现象已不多见,大学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等方面开始带有地方、区域和民族的特点。

上述种种变化集中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大学不再仅仅是教会的教育机关。它们开始至少是部分适应世俗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需要”<sup>[6]</sup>。例如,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政府需要大量的关于诉讼和权利的法律顾问,一些法学家能够获得比众人高得多的最丰厚的待遇,与此相对应,大学里的神学学科失去了权威性的地位,即使在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法国和英国,神学博士的光辉时代已开始日薄西山,法学家们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尤其是民法和刑法,而不是教会法。<sup>[7]</sup>此外,新兴的上流阶层对教育产生了与中世纪时期不同的需求,为上流社会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他们上大学时也主要选学各类艺术学科,他们把旧的大学当作进修学校。<sup>[8]</sup>在社会对大学的推动下,较之于中世纪,大学的培养目标逐渐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保守、传统著称的“牛桥”都有明显的变化,从培养神职人员为主往培养绅士阶层转化。两所古老的大学试图通过古代语言、历史及文学等方面的教育,提倡和追求人格的完善,以期达到造就绅士阶层的目的。尤其是剑桥大学,还开设了有关商业、造船等学科的讲座,以迎合当时逐渐兴起、日益壮大的工商业阶层。<sup>[9]</sup>

总之,在19世纪之前,我们已很难发现16世纪之前大学国际性和行会组织的特点,中世纪大学无论是在内部运作方面,还是在与外部关系方面,已逐步地进行着调整与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世俗化与区域化、民族化相辅相成,各大学逐步加强了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中世纪统一的大学教育模式被逐渐摒弃。

## 二、科学研究引入大学

尽管中世纪大学从16世纪到18世纪一直在努力走出“僧侣的村庄”,不过,革命性的变化并未发生。事实是:中世纪大学从16世纪开始衰落,17世纪末至18世纪跌入低谷——这一时期被学术界普遍称作大学发展史上的“冰河期”。中世纪大学的衰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人文学科已在大学受到普遍欢迎,但作为在17世纪已在社会发挥极其重要影响作用的科学尚未在大学获得应有的地位。大学提供的传统教育与在大学之外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于是,从整个18世纪一直到1810年,各国的改革者们都致力于在大学之外建立专门化的职业学校来取代大学的学院式教育。法国一时将传统的大学停办。<sup>[10]</sup>直到以柏林大学的改革为转折点,中世纪大学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征程。柏林大学改革的成功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中心地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教师聘用制度。教授作为教学和科研的主力,对他们的聘任标准就更表现为科学研究至上、质量至上。《德国史1800—1866》有这样的记载:“在选择教授人选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地区的考虑,不是同事个人的好恶,不是社会交往能力或口才好坏,也不是笔头或讲课能力,而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独创性。”<sup>[11]</sup>柏林大学把聘任一流的学者与教授当作头等大事。柏林大学在开办的时候,共有24位正教授:属于神学院、法学院的各3人,属于医学院为6人,其余12人则一律属于哲学院。<sup>[12]</sup>这样的教授队伍在当时是很可观的。

第二,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柏林大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以往大学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神学院为哲学院所代替,哲学院开始跃居神、法、医各院之上,成为大学的核心和顶端,成为统合和评判各种知识和学科的标准。哲学院开设的课程不仅包含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且还引进和设置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并且所有的课程,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都强调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传授,崇尚纯学术研究,拒绝和反对教学和研究内容的实际操作性以及应用开发性。尤其重视开设语言学、数学等课程,其目的在于通过艰深、晦涩和纯思辨的语言和数学训练,培养学生孜孜不倦、知难而进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sup>[13]</sup>此外,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这四科的内涵也与过去有明显不同,即更加“科学化”和“专门化”。像中世纪和近代初期那样“一般学术大师”(Antium liberalium magister)的称谓已不再继续使用,代之而取的,乃是化学专家、数学专家、物理专家一类确定研究范围的头衔。至此,大学教授不再是以往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教书匠,而是学有所长、术业有专攻的科学研究者。

第三,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教学制度。纯粹的科学不追求任何外在的目标,不能为任何外在因素所制约。因此,“柏林大学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sup>[14]</sup>。由此具体形成了体现“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的教学制度。要保证教授“教的自由”,教授治校自然顺理成章。首先是采用有利于“教的自由”的讲座制。

拥有讲座的教授是该专业的权威，是实验室、研究所的核心，拥有教学、研究和聘用私授讲师和助教的自主权。为了进一步落实“教”“学”自由，大学采用“教授治校”权力模式，权力主要掌握在教授手中：各学院正教授负责讨论决定本院内部事务，院长从他们中间自行选出；全体正教授组成校评议会，共同就全校性事物作出决策<sup>[15]</sup>。

第四，国家为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保障与支持。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大学运作，已不同于传统的聚众讲学的方式，需要庞大的资金、人力支持。柏林大学改革确立了大学的公立机构性质。大学属公立机构，由国家拨款；教授由政府所聘，是国家公务员，从国家领取工资。大学由国家举办，主要是从国家获得物质保障，而大学的自治权与独立性是不容侵犯的。大学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国家应当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明确自身对大学天然和潜在的危害，将其对大学不得已的干预作尽量限制，不试图将大学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用洪堡的话来说，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sup>[16]</sup>。

### 三、结语：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比照

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到柏林大学的改革，历史虽然只为我们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但实际上大学向现代的转变却历经几个世纪。脱胎于基督教神学修道院的中世纪大学终于挣脱了教会的控制以及神学的禁锢，在经历了由一个宗教性机构向世俗化演变之后，以19世纪柏林大学的改革为分水岭，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这种转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世纪大学是教会机构，大学由教会操纵，大学主要是为培养神职人员服务，追求“彼岸世界”。现代大学则完全是世俗化的机构，更多地受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为国家发展服务：“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sup>[17]</sup>，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新人”为目标；中世纪大学是“七艺”的“世袭领地”，“神学”的“一统天下”，世俗学科或人文学科难登大雅之堂，科学更当作“异端邪说”遭到严酷压制，伽利略、罗吉尔·培根等许多大胆的科学的追求者都难逃宗教迫害的厄运。在现代大学，人文捷足先登，科学后来居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从此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两翼；中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大学教师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职责，因而大学组织形式是自愿结合的、小规模、类似手工作坊式的行会。柏林大学的改革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从此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性。大学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更重在创新知识，他们越来越成为某一专门领域的精深的专家和研究者。科学研究进入大学的意义还不仅仅于此，它开创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转变方

向：大学组织内越来越细的学科分类，自由选课制度的出现，习明纳制度、讲座制度以及研究所的出现等等无不显示着，大学的组织与活动几乎完全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接纳了科学与科学研究，现代大学才最终形成。正如历史学家梅尔茨(Theodore Merz)所言，“大学制度一言以蔽之，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事科学研究，此乃其引以自豪和获得声誉的根基。”<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7.
- [2] [法] 雅克·勒夫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08.
- [3] 滕大春. 外国近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10.
- [4] 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编译. 德国的大学[Z]. 1984: 25.
- [5] Burton R. Clark & Guy Neave. The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Volume 2. B. P. C. C. Wheaton Ltd, Exeter. 1992: 1253.
- [6] 伯顿·克拉克编.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34.
- [7] 丹尼斯·哈伊.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 李玉成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178.
- [8] 同[7]
- [9] 黄福涛. 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42 - 43.
- [10] 王天|, 夏之莲等. 外国教育史(上册)[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173.
- [11]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94.
- [12] 田培林. 教育与文化(下册)[M].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65: 559.
- [13] 该部分详见黄福涛. 从课程设置看柏林大学的近代意义[J]. 高等教育研究, 1996, (5): 91.
- [14] 同[1], 125.
- [15] 同[11], 32- 33.
- [16] 同[11].
- [17] 尤西林.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3): 1.
- [18] 贺国庆.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195.

(责任编辑: 胡志刚)